

辉映文化星空的 经学大师



经学是解释、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。汉代是儒学经学化的时代。汉武帝即位后,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,实行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学术统一、思想统一政策,改变博士原有制度,增设五经博士,从此儒学独尊,儒家典籍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,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,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、解释五经为主业。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,并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,对中国的政治、学术、文化教育、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由此汉代也涌现出辉映传统文化星空的一大批经学大师,枣庄地区即产生了眭弘、颜安乐、马官、疏广、疏受、匡衡等经学大师。

一、今文《春秋》学者眭弘

眭弘(?-公元前78年),字孟,西汉蕃(今枣庄市滕州市)人,著名的今文《春秋》学者。眭弘年轻时斗鸡走马,有侠客之风,及至年长,乃幡然从文,师从嬴公学习《春秋》,后以明经被朝廷授为议郎,官至符节令。

汉武帝在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、设立五经博士的过程中,特别提倡《春秋公羊》学。董仲舒在阐释、解读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中提出“天人感应”学说,将自然界中出现的种种灾异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,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必然性,从而创立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学,借天道说人事。神学与经学的结合也开创了汉代盛极一时的谶纬之学的先声。但同时,以灾异现象论说人事对统治者有约束、规诫作用,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为所欲为。但如果儒者根据《春秋》陈说灾异超过最高统治者可以接受的限度,也会导致非常残酷的结局。眭弘就因为坚持以“天人感应”来映照当时的政治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汉昭帝元凤三年(公元前78年)正月,泰山、莱芜山南发出如数千人呐喊的声音,民众前往观看时,发现“有大石自立,高丈五尺,大四十八围,入地深八尺,三石为足。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”。同时,昌邑神社的枯木竟然重生,汉官上林苑中的大树本来已断枯卧地,也重新竖立,获得新生,树上被虫蚕食的叶子显现“公孙病已立”的字样。在《春秋》公羊学的思维定式中,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灾异,按《洪范》五行说的分类,属于草木、金石之妖及虫祸。

眭弘根据所习《春秋》公羊学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,认为石、柳为阴类,是一般民众的征兆;而泰山为岱宗之岳,是王朝兴替之兆。如今大石自立,僵柳复起,非人力所能为,应该昭示当有自匹夫出身的人来做天子。因此眭弘向朝廷上书,提出自己的主张:“先师董仲舒有言,虽有继体守文之君,不害圣人之受命。汉家尧后,有禅国运。汉帝宜谁差天下,求索贤人,禅以帝位,而退自封百里,如殷、周二王后,以承顺天命。”《汉书·眭弘传》。让汉昭帝遣人自民间探访贤能之士,将君位禅让。当时汉昭帝年幼,大将军霍光执掌政权,对眭弘的建议当然恨之入骨,就将他的上书交与廷尉处置。廷尉遂上奏认为,眭弘的主张乃是妖言惑众,大逆不道。眭弘最后被处斩,为自己的学术主张献出了生命。

二、《春秋》“颜氏学”开创者颜安乐及传人马官

颜安乐,字公孙(生卒年不详),汉代东海郡薛县(今枣庄市滕州市)人,汉代知名学者、教育家。汉宣帝时被封为经学博士,出任齐郡太守丞,后为仇家所杀。颜安乐一生致力研究《春秋》公羊学,为《春秋》“颜氏学”的开创者,著有《春秋公羊颜氏记》。

颜安乐自幼家贫,但笃志于学,师从其舅父、精研《春秋》的经学大师眭弘。眭弘先后收弟子百余人,其中有两个弟子最为他欣赏,一个是他的外甥颜安乐,另一个是下邳的严彭祖。二人常在一起读书,切磋学问,遇有疑难的问题便展开热切的讨论,都能各抒己见,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。眭弘曾评价二人说:“《春秋》之意在二子矣。”眭弘被杀后,颜安乐和严彭祖继承师训,办学收徒,传承《春秋》公羊学。人们又称他们主办的经学叫“颜严之学”,后来,颜、严二人各回原籍办学。颜安乐的弟子成名成才者众多,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,有个弟子是淮阳的冷丰次君,后来做了朝廷里的少府官;有个是淄川的任公,后来做了淄川太守。

人们又称颜氏家学为“冷任之学”。其间,眭弘的弟子贡禹又官升御史大夫,疏广也做了太子太傅,加之汉代初年的叔孙通也是薛县人,后被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“汉家儒宗”,汉王朝的诸多达官显贵出自蕃、薛、蕃、薛二县的教育声名远扬。疏广收琅琊的管路为门生,贡禹收泰山的冥都为门生,管路和冥都后来又投奔颜安乐,拜其为师。管路后来做了御史中丞,冥都做了丞相,世人又因颜氏家学的再传弟子成名,称之为“管冥之学”。其后,管路收孙宝为门生,孙宝官居大司农。冷丰次君收马官为门生,马官做了九卿;收琅琊的左成为门生,左成做了都守。桃李无言,下自成蹊。师承徒效,代代相传。蕃、薛的教育成为当时培育英才的摇篮,令世人刮目相看。

《春秋公羊颜氏记》共11篇,是颜安乐一生致力学术研究的力作和学术思想的结晶,但后来失传。颜师古校注《汉书》时对颜安乐的事迹就已记载不详了。清代学者马国翰从大量古籍中收集到历代学者引用《春秋公羊颜氏记》的章节内容,将其辑于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里。

马官,字游卿,东海戚(今枣庄市滕州市)人。是冷丰次君的弟子,也就是颜安乐的再传弟子。

《汉书·马官传》载其治《春秋》严氏,即严彭祖之学,与颜安乐的学术同出一流。马官以射策甲科为郎,后升迁为楚国长史、丞相史司直丞相丹认为马官行能高洁,就举荐其为廷尉平,后又复任青州刺史、汝南太守、九江太守等职,在每个职位上,马官都尽职尽责,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。后又相继被征为詹事、光禄勋、右将军,代替孔光为大司徒,封扶德侯。太师孔光病故后,马官又接任太师兼司徒官,以自己的学术水平及人格魅力位极人臣,可谓颜氏家学培育出的杰出人才。

三、太傅疏广与少傅疏受

疏广、字仲翁,西汉东海兰陵(今枣庄市峰城区)人。疏广自幼好学,师从著名经学大师眭弘,故学识渊博,“明《春秋》”,对《春秋公羊传》微言大义见解独到,阐释精妙,因而声名远播,各地儒生都慕名而至向其求学。

朝廷闻知疏广的学识和声望,征为博士、太中大夫。汉宣帝地节三年(公元前67年),大将军霍光病死,汉宣帝亲理朝政,立8岁的儿子刘奭为太子,任命丙吉为太子太傅,疏广为太子少傅。数月后,丙吉迁御史大夫,疏广徙为太子太傅,专门教授太子读《春秋》。

疏受,字公子,是疏广的侄子。他以“贤良”的身份被举荐为太子家令。疏受举止文质彬彬,为人谦恭,做事谨慎,且反应机敏,善于辞令。一次,宣帝驾临太子宫,疏受迎接皇上,言谈举止,彬彬有礼。“及置酒宴,奉觞上寿,辞礼闲雅,上甚欢悦。”宣帝对其很是满意。不久,授予疏受为少傅。太子每次上朝时,太傅在前,少傅在后,有礼有节,仪态端雅。文武百官看在眼里,心中暗暗钦佩。他们都认为叔侄俩并为太子老师,配合默契,自古以来还没有过,朝廷应以此为荣!

太子的外祖父,平恩侯许广汉曾向宣帝提出要求,借口皇太子年少,请求任命一个监护人,而这个人选则由自己的胞弟、中郎将许舜担任最为合适。宣帝就此事咨询疏广。疏广回答道:太子是国家的国储副君,一定要以天下英俊为师友,不应该只亲近外戚许氏。并且太子已经接受太傅、少傅等人的教育,官属也已齐备,再让许舜监护太子,只会使太子见识浅陋,无法让天下人了解太子的德行。宣帝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,并将疏广的话告诉了丞相魏相,魏相脱冠谢曰“此非臣等所能及。”对疏广的见识表示衷心的钦佩。汉宣帝对疏广叔侄更为敬重,多次赏赐他们。

疏广、疏受除给太子讲授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外,还谆谆教导他将来做了国君后要以民为贵,省徭薄赋,缓刑宽政。太子刘奭长至12岁时,学业已有所成。有一天,疏广对疏受说:“吾闻‘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’,功遂身退,天之道也”。今官至二千石,宦成名立,如此不去,惧有后悔,岂如父子相随出关,归老故乡,以寿终终,不亦善乎?”受叩头曰:“从大人议。”于是,叔侄俩便在同一天向朝廷上书告病,移居宫外。3个月后,病假期满,宣帝召他们复职。疏广等再次上疏,称年迈多病,无法再履行职守,恳切要求告老还乡。汉宣帝以其年老,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,赐予黄金20万,太子刘奭又赠50万。

疏广、疏受离京之日,朝廷的公卿大夫、亲朋故旧以及同乡学子数千人在路旁设宴为其饯行,相送者的车辆达数百乘,旁观者都感慨地说:“贤哉二大夫!”叔侄俩回到故乡后,将皇帝所赐财物大半分给乡人,并每日在家中设宴,请族人故旧宾客把酒言欢,并经常询问家里的财物,催促卖掉以换取酒食。过了年余,疏广的子孙颇为不满,希望疏广生时利用这笔钱为他们购置一些田宅,作为子孙永久之业,并委托一位疏广平素信重的同族老者转达这个意思。疏广言道:“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!顾自有旧田庐,令子孙勤力其中,足以共衣食,与凡人齐。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,但教子孙怠惰耳。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愚而多财,则益其过。且夫富者,众人之怨也;吾既亡以教化子孙,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又此金者,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,故乐与乡党共之,以尽吾余年,不亦可乎!”老者很是叹服其见解。后来,叔侄俩皆以寿终。

宗族乡邻对疏广、疏受叔侄的人品和散金之德感念不忘,为了寄托怀念之情,便在他们曾居住过的宅基上筑起土台(今峰城区萝藤村),加以保护,留作纪念并且将土台命名为“散金台”,后世又称为“二疏城”。明代弘治五年(1492年),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在散金台上创建“二疏祠”,广植树木,立有碑碣。嘉靖十年(1531年),兵备金事李士允又命峰县令李孔贻重修“二疏祠”,并在

祠堂内塑了二疏像,刻碑记述其事。而今,散金台故址犹存,二疏墓就在距散金台西面不远处的小山上。游人每当来这里凭吊先贤时,会自然想起清光绪《峰县志·艺文志》中颂扬二疏的诗句:

冠盖如云出帝乡,散金间里有余光。
二疏萧傅俱尘土,千古遗风谁短长。

四、凿壁偷光的匡衡

匡衡(生卒年不详),小名鼎,字稚圭,东海郡承县(今枣庄市峰城区)人。西汉经学家,以说《诗》著称。匡衡是西汉宣、元、成三朝重臣,历任太常掌故、郎中、平原文学、博士给事中、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、光禄勋、御史大夫。建昭三年(公元前36年),被任为丞相,封乐安侯,食邑六百户,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,被控以“专地盗土”之罪免官。

匡衡家世代务农,但匡衡十分好学,勤奋努力,精力过人。由于家境贫寒,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费用。匡衡家中无供其夜读的烛光,亦缺乏书籍,求学困难。隔壁邻家较富,灯烛常亮至深夜,匡衡惜时如金,便在壁上凿一孔,借用透来的一丝烛光,埋头苦读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。同邑一大姓家富,藏书很多。匡衡为其佣工,不要报酬,主人感到奇怪,问他缘故。他表示愿以尽读主人藏书作为酬劳,主人深为感叹,就把藏书供其博览。匡衡学问日进,并与董望之等拜同郡经学大师后仓攻《诗经》,对《诗》学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,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“无说《诗》,匡鼎来。匡说《诗》,解人颐”之语,可见匡衡对《诗经》理解之深。

但匡衡的仕途并不平坦。汉制,博士弟子掌握“六经”中的一经,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,考试得甲科者可补为郎中,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,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。经过9次考试,匡衡才中了丙科,任为太常掌故,后又补为平原郡的文学卒史。朝廷很多官员赏识匡衡的学识,建议其留在京都。太子刘奭也很欣赏匡衡,并且有很多人自愿要求去平原跟随他求学。但因为汉宣帝不重视儒生,他只能至平原就职。

黄龙元年(公元前48年),汉宣帝驾崩,刘奭即位,是为汉元帝。时外戚、乐陵侯史高与萧望之共掌朝政,二者产生矛盾。史高为笼络人才,向元帝举荐匡衡。元帝本就赏识匡衡,并喜好儒术文辞,尤其爱《诗经》,故以匡衡为郎中,迁博士、给事中,匡衡遂成为元帝的近臣。

初元二年(公元前47年),发生了日食和地震。因汉代重视天象地理的变化,自然之变必有社会因素。元帝遂诏问大臣政治得失。匡衡上书,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,祸福全在于人的作为,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。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,亲近忠臣正人,疏远佞臣小人,选拔贤良,开放言路接纳忠谏。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,提升他为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。

汉元帝对宣帝的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治国方针颇有更改,而投其所好之徒乘机窥见,争言变更旧制,导致朝局混乱,并且汉元帝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,也为朝廷埋下不安定的因素。匡衡对此很是焦虑,遂上书元帝,提出应该弘扬先帝功德,常思祖业,尊重旧制,绝巧伪之徒,以安定众心,不要以私恩害公义,不能当亲者疏,当尊者卑,以免祸乱国家。

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,琅琊人贡禹为御史大夫,华阴县代理县丞嘉上书推荐朱云代

理御史大夫。元帝让公卿讨论此事。匡衡认为,小小的代理县丞算大臣职位,绝不是以国家社稷为重,朱云平素好勇,数次犯法亡命,学儒后也没有突出德行,而贡禹清静廉政,经术通明,海内皆知。应该对嘉的动机加以审查。嘉因此坐罪。

数年间,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,引经据典,阐明法理道义,很受赞赏,由此升任为光禄勋、御史大夫,后来又升为丞相,封为乐安侯。

元帝后期时,宦官石显为中书令,他结党营私,把持朝政,怂恿元帝加重赋役,剥削人民,但因有皇帝的宠幸,没人敢触犯他。成帝即位后,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,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,并列举他的党羽,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、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。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年),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,遭到弹劾,被贬为庶民,返回故里,不几年,病死于家乡。

五、一代廉吏王良

王良,字仲子,东海郡兰陵(今枣庄市)人。王良年少时酷好读书,精通《小夏侯尚书》。王莽代汉后,曾屡次遣人征召王良入朝为官,王良皆称病拒绝入仕。他在故乡兴办私塾,教授学生1000多人。

建武二年(公元26年),大司马吴汉征召王良,王良没有答应。建武三年,他应召入朝,被授谏议大夫。王良多次向皇帝进忠言,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,为人举止合乎礼仪,颇受朝廷的敬重。后来王良任沛郡太守,但其不愿在地方上为官,故行至蕪县时上书称病辞职。朝廷改任他为太中大夫。

建武六年(公元30年),王良代替宣秉任大司徒司直。他在任上忠于职守,生活简朴。其妻子儿女从不进入官舍,长期居住在故乡,终年在田间耕作,穿戴的是粗布,用的器皿都是瓦器。有一次,司徒史鲍恢有事到东海,经过兰陵,遂至王良的家看望王妻。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,从田里回来。鲍恢以为是王家的女仆,便对她说:“我是司徒史,特意来捎带书信,想要见您家夫人。”王良的妻子告诉他实情,并称没有事情不需要捎书信。鲍恢绝没有想到大司徒司直的家庭如此寒苦,非常感慨。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王良的为政清廉及对家庭的影响,真可谓一代廉吏。鲍恢回京后,此事逐渐传播开来。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王良的。

不久,王良因病回乡。一年后又被征召,他行至莱阳后病重不能继续前进,欲就近到一位朋友家进行调养。友人不仅没有接待他,而且责备他:“没有忠言奇谋而取高位,何其往来不屑不憚其烦也?”他对王良数次辞职又重新入仕、往返奔波、一心谋取高位不以为然。王良听到朋友的指责也很惭愧,立即返回故乡,从此不再入仕。面对朝廷的屡次征召,王良总是称病不出。他的这种行为也招来另一方面的非议,博士范生就认为,王良等用拒绝征召的方式抬高自己的身价,实际上他们“文不能演义,武不能死君”,只是一味巧采华名,欲借此得到三公之位。这个评价虽然就当时社会风气而言一针见血,但王良的急流勇退则更为难得。

后来光武帝驾幸兰陵,派遣使者问候王良,王良已病重不能说话。光武帝诏令免除王良的子孙在乡邑中的劳役,后来王良以布衣终老乡老。

范晔曾评论王良:“王良处世优重,而秉甘疏薄,良妻荷薪,可谓行过乎俭。然当世咨其清,人君高其节,岂非临之以诚哉!”对王良的廉洁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。

本文选自《枣庄文化通览》